

狄兰·托马斯诗歌中的死亡生态观

田蒙可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DOI: 10.12238/ems.v6i11.9986

[摘要] 狄兰·托马斯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其作品在过去60年来一直与威尔士文学和文化密切相关。本文旨在从生态诗学的角度探讨托马斯诗歌中对死亡主题的处理，分析其独特的诗歌风格和死亡观念。本文认为，托马斯将生与死置于自然的维度中考虑，而是将其视为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死亡是新生的开始。通过对其个人经历及部分代表作品的分析，本文揭示了托马斯如何在诗歌中运用自然元素来表达对生命、死亡和人类情感的深刻理解。同时，本文也探讨了托马斯的文化背景与创作背景，思考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他对死亡的独特视角。

[关键词] 狄兰·托马斯，死亡主题，诗歌风格，生态诗学，生命循环

The Ecological View of Death in Dylan Thomas' Poetry

Tian Mengke

North University Colleg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ylan Thomas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et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his works have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Wel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for the past 60 year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omas' handling of the theme of death in his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oetics, and analyze his unique poetic style and concept of deat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omas considers life and death in the dimension of nature, but rather as part of the natural cycle, where death is the beginning of rebirt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som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Thomas uses natural elements in his poetry to expres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life, death, and human emotions. Meanwhile,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omas' cultural and creative background, considering how these factors have shaped his unique perspective on death.

[Keywords] Dylan Thomas, death theme, poetic style, ecological poetics, life cycle

1. 引言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也是威尔士文化与文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中，死亡几乎是其最重要的意向与主题。笔者以为，托马斯笔下的死亡是独特的，也是生态的。死亡与生命紧密相连，互相循环。这一死亡观源于威尔士自然传统、深受基督教影响，并在最后归于其自己的人生中所形成的深刻思考。只有理解了托马斯笔下的死亡，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其诗歌独一无二的重要价值。

本文将从生态诗学的角度探讨托马斯诗歌中对死亡主题

的积极处理。通过分析他的代表作品，我们将揭示托马斯如何区别于其它诗人，将死亡视为生态循环的一部分。本文也将提及他独特的风格，他如何通过描绘死亡来表达对生命的永恒热爱，他的这一风格又是如何侧面体现出其生态诗学观念的。同时，我们也将考察托马斯的创作背景，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塑造了他对死亡的独特视角。

2. 狄兰·托马斯的生态死亡观

2.1 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

托马斯于1914年出生于威尔士的斯旺西。他的名字“狄兰”，源于威尔士语中的神祇“海之子(Dylan ail Don)”。

(令人联想到中国同样一位深受浪漫主义影响,以“死亡”为主题的诗人海子。)其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牧师。托马斯从小多病,瘦弱,这让他自孩童时便对死亡有了敏感的认知。成长的阶段,他接受着基督教与当地威尔士文化的影响。自小学开始写诗,威尔士文化中的吟游诗人传统与对大自然的歌颂从幼年时就影响了他的风格。同时作为英国人,他也深深地被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英语主流文学所吸引,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踏在追随布莱克的道路上,却远远落后,只得一窥其足踵上羽翼。”因此,他虽以威尔士文化为自豪,一生中的主要作品却以英文写作。我们会发现,这一仿佛矛盾的情况,不仅在他的生活中,也在他的诗歌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

他继承了浪漫主义运动强调个人情感、自然之美和想象力的重要性,在他的诗歌中大量运用自然元素和象征手法,表达炽烈的情感。但相比于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晦涩难懂,更加注重音乐性,注重技巧。充斥着宗教与哲学因素。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痴迷于死亡,时间,诞生前的生命,与神秘的自然。浪漫主义诗人要么回避死亡,要么只将生与死的观念视为诗的一个暂时性主题。但狄兰·托马斯虽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激情,却将对自然生死循环的敬畏置于个人情感、个体认知之上。死亡,以及与之相对的生命,是托马斯诗歌中的永恒母题。

正因为如此,虽然他的创作的确受到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但如阿克曼所言,“他的诗歌在任何程度上都并非源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也非承自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如叶芝、奥登等。对他的诗歌影响最大的,或许是弗洛伊德。

证据便是梦也是他诗歌里的一个常见主题,在这些梦里,作为主角的他,要面对各种或虚妄或现实的恐惧、焦虑和迷茫。但最终,这些诗歌都描绘了他如何自黑暗转向光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诗歌是我从黑暗走向某种光明的记录”。从根本上来说,狄兰·托马斯是乐观的,他的诗也是充满希望的。因此,虽然托马斯在孩童时代常常害怕自己会因为肺结核而早逝。虽然成年后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他心生恐惧,使他十年间几乎放弃诗歌。但最终,作为主题的死亡,在托马斯的诗歌里也往往孕育着生命的希望。托马斯曾自称他的诗歌是“子宫与墓穴的诗”。其恒久的主题便是出生、交合与死亡。

因此,在他十来岁发表的《那透过绿色雷管催生花朵的力》中,死亡与生命彼此交织,难分彼此,共同受到时间的审判。在诗里,绿色的花茎变成了毁灭的雷管,却能绽放花朵;裹尸布变成风帆,淋漓的鲜血曾是山口的清泉。于是生变成了死,死又变成了生。他写道:“而我无可言告爱人的坟

墓/我的床单上也蠕动着同一只蛆虫。”唯一置身其外的只有时间,它的滴答声仿若天堂。

2.2 威尔士渊源与生态化的死亡观

生,死,时间,花朵,天堂。这些意象在此后无数次地以不同面貌出现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之中。托马斯对它们的思考并非出自理性。20世纪前中期,正是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机器逐渐取代人的时代。托马斯却舍去了理性的解释,而寻求人类内在的生命力,以对抗这一对人的扼杀。而威尔士传统则以各种方式塑造了他的反抗。

威尔士为他的诗歌提供了地点与主题。威尔士作为一个僻静,多山的区域,在英国境内不以工业发达闻名。威尔士的传统是田园牧歌,是喜爱歌唱的吟游诗人,和美丽神秘的自然。在托马斯的许多诗里,自然总是伴随着死亡的主题一并出现。它时而温和,时而冷酷,但最终总是带来生的希望。《那透过绿色雷管催生花朵的力》中,带来毁灭的雷管是绿色的,能催生出花朵。而绿色总是代表繁殖力,代表生机。

在威尔士文化中,大自然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每年威尔士人会庆祝春季节、丰收节等,威尔士诗歌与传说中,自然,精灵与山脉湖泊里诞生了无数的故事。在狄兰·托马斯的笔下,威尔士与壮美的大自然也总离不开。《序诗》中,他更是用上百行去描绘自己眼中的威尔士——充满绿意、花朵与高贵的动物。

但与传统威尔士诗人不同,大自然在托马斯的笔下并非仅仅是一个意象,或一个主题。自然于托马斯而言,是更重要,更高维度的存在。自然主宰着生死,又自生死中体现自我的存在。在《死亡也无法统治万物》里,托马斯写,“不屈的头颅锤开覆满雏菊的坟茔”。生死循环就存在于自然之间,而它美丽的花朵即是对于死者的安慰,也是复活的承诺。

因此,托马斯的诗在审美维度上具备明显的生态诗学特征。生态诗学讲述的,不仅仅是以生态自然为主题,更是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托马斯笔下的死亡与生命的循环,不同于其他诗人笔下的生死循环,具有浓厚的自然特征。诗人如海子,笔下的自然是个人冲突的外化,无主体性。其生死循环(如《春天,十个海子》)则是静态的,是冷漠与异化的。但托马斯笔下的生死循环则恰恰相反,是动态的向前行进。死者与生者并非永恒轮回,而是在死者的枯骨上诞生出全新的生命。在《死亡也无法统治万物》里,托马斯相信,每个自然界的物体,无论是人还是花朵都有复活特性,正如他所说:主题的首尾句摘自圣保罗,在《罗马书》6:9:“死亡没有再统治”。第一和第二节的“从海中复生”基于《启示录》20:13:“海交出死者”。他开篇说人死后,肉体变成骨骼,甚至骨骼也会消失。但他相信死者与自然界的物体合为一体。

然后,托马斯让人归于——“风中的人和西天之月”。他将死亡定义为一种把身体各个元素恢复到其本源并与自然融合的东西。无论人在死时的状态如何,“人终将复生”。他说,那些被生活折磨的人可能失去信仰,但他们也将复生,因为救赎不是通过信仰,而是通过自然。经历的挣扎和可怕的经历使他们变得强大。

在另一首诗《拒绝哀悼在伦敦因火灾而死的儿童》中也是如此:死亡是开始,不是结束。死亡是生命的更新。一个人死去,便是重生。正如他所说:“在第一次死亡之后,不会再有其他”,因为那时一个人变得永恒,成为自然进程的一部分。在这首诗中,狄兰积极地面对死亡,他没有哀悼,而是庆祝孩子们的死。他拒绝“让祈祷的阴影成为声音”,认为祈祷毫无意义,没有所谓的神的恩惠。相反,托马斯说认为孩子通过赋予死亡“威严”,消除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生活是美丽的,死亡必然宏大。

2.3 自然与个人

因此,狄兰·托马斯的死亡观念可以说是生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托马斯的幼年时的基督教教育使他的诗歌中常有丰富的宗教因素。在《火灾后的仪式》里,他使用基督教的意象和仪式来庆祝死者。对诗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不洁的,而是其本质上是神圣的。死者变成了圣人;他们的形象通过死亡的过程被理想化和神圣化。对他而言,无论是他的父亲、姑姑、街上的老人,还是伦敦的孩子,所有这些死者都是圣人和殉道者。他们从凡人的状态提升到圣人的状态。但这些宗教化的手段通向的并非人格神,而是大自然,或者说,我们人类的自然形态。在自然中,生与死动态地向前循环,个人会在死后回归山岳、河流,回归作为整体的自然。并准备着以全新的方式复活。对托马斯来说,个体可以通过沉浸在自然的世界中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但正如生态系统里的每一个生物都会挣扎求生,狄兰·托马斯从未在自己的诗中对死亡采取犬儒般的平和态度。在他最著名的诗《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中,托马斯承认死亡不可避免,但他却劝告所有将死之人,包括自己的父亲,要奋起抵抗。不要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认命,不要放弃。这首诗的简单主题体现在两个押韵的词“夜”和“光”中,像诗《公园中的驼背人》中“黑暗”和“公园”一样,代表了死亡和生命。托马斯相信,一个人不应安静地接受死亡,而应该“愤怒地对抗光明的消逝”。他以“智慧的人”、“善良的人”、“狂野的人”和“严肃的人”为例,暗示无论他们的生活如何,或在临终时的感受如何,他们都不应放弃,应该奋力抵抗即将到来的死亡。

3. 结语

狄兰·托马斯生于威尔士,却用英语而非威尔士语写作,这曾为他自双方都招来了不少的批评。可他从未将自己的威尔士传统与盎格鲁传统割裂开来。正是两种传统的混合创造出了这个独一无二的狄兰·托马斯,如约翰·古德比教授所言,“不必成为威尔士的艾略特或阿伯塔韦(威尔士语中的斯旺西)的奥登”。

这种混合,这种创造,正是托马斯诗歌的独特魅力,也是他生死观的内核。他从未将生与死,个体与整体,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始终认为,唯有这两种看似区别的主体的结合,才能创造出全新的,更加美好的未来。早在《那透过绿色雷管催生花朵的力》中,他就谈到了创造的能量,这种能量既创造又毁灭,存在于所有自然和现实之中,将生命与死亡结合在一起,并将诗人——诗中的“我”——与宇宙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力量穿过植物的根茎,使其在毁灭中焕发生机和活力。这就是狄兰·托马斯眼中生与死的循环,也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循环。在每一次出生中都有死亡的元素,而每一次死亡在某种程度上都蕴含着重生的暗示。驱动“炸裂根部”的生命力也推动花朵穿过土壤绽放,死亡也是自然生长的一部分。生命的力量与死亡的力量紧密相连,它既驱动着人的青春,也最终将导致人的死亡。狄兰·托马斯这一生态死亡观,使得他的诗歌,历经几十年文学与文化的变革,却直到今天都焕发着无限的活力。正如同大自然中的万物,无论海枯石烂,朝生暮死,永远迸发着生的意志。

【参考文献】

- [1]海岸. 一首海钓式猎艳歌谣——狄兰·托马斯“进程诗学”之“生死爱欲”[J]. 世界文学, 2021(06).
- [2]孙莉珂. 狄兰·托马斯《羊齿山》中的过程诗学[J]. 新纪实, 2022(16).
- [3]王嘉玲. 评价理论视域下狄兰·托马斯诗歌中的死亡观[J]. 钦州学院学报, 2015(06).
- [4]蒲海丰. 迪兰·托马斯诗歌的威尔士性与过程诗学: 约翰·古德比教授访谈录(英文)[J]. 外国文学研究, 2018, 40(02).
- [5]时光是一座奔跑的坟墓——狄兰托马斯诗中的时间主题[J]; 齐硕, 青年文学家, 2014(06)
- [6]Thomas, Dylan. Collected Poems (1934-1952).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77. Print.
- [7]Havard, Robert G. "The Symbolic Ambivalence of 'Green' in Garcia Lorca and Dylan Thomas."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vol. 67, no. 4, Oct. 1972, pp. 810-819. doi: 10.2307/3724499.